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比较

06 09

世界市场和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均衡
by Liu He 刘鹤

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事实、原因和对策
by Chong-en Bai and Qian Zhenjie 白重恩 钱震杰

体制是关键，出路在改革
50名经济学家问卷调查
b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tudies 《比较》编辑室

危机时期的政策反思
by Wu Jinglian 吴敬琏

经济学家并没有错得离谱

Economists Didn't Get It So Wrong
by Eric Maskin 埃里克·马斯金

新卡尔多事实：创意、制度、人口和人力资本

The New Kaldor Facts
Ideas, Institutions, Population, and Human Capital
by Charles I. Jones and Paul M. Romer
查尔斯·琼斯 保罗·罗默

制度与环境

Institution and Environment
by Elinor Ostrom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制度：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Institutions: Top Down or Bottom Up
by William Easterly 威廉·伊斯特利

资产价格和货币政策

Monetary Policy and Asset Prices
by Lorenzo Bini Smaghi 洛伦佐·斯马吉

下一轮更严重的金融危机悄然逼近

The Next Financial Crisis
It's Coming and We just Made It Worse
by Peter Boone and Simon Johnson
彼得·布恩 西蒙·约翰逊

2008年股市崩溃期间公司治理失败了吗？

Did Corporate Governance "Fail" During the 2008 Stock Market Meltdown? The Case of the S&P 500
by Brian R. Cheffins 布莱恩·谢芬斯



comparative
比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 第45辑 / 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086-1861-6

I. 比… II. 吴… III. 比较经济学 IV.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9289 号

比较 · 第四十五辑

主 编: 吴敬琏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比较》编辑室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9.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1861-6/F · 1862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comparative 比较 卷首语

始于2008年9月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让世界经济突陷危局，险象环生，经过全球主要经济体政府纷纷采用扩张性宏观政策进行国际协调的干预，第三季度全球宏观经济数据明显好转，中国无论在宏观政策还是复苏势头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备受世人瞩目。主编吴敬琏教授在谈到这次危机和政策应对时指出，“经济复苏的苗头萌出后人们所产生的乐观情绪很可能使我们不去继续深化对危机产生机理的认识，不能正确处理后危机阶段各种后续的政策问题，从而重蹈覆辙。”尤其是对于正处于处理全球金融危机关键时期的中国而言，反思危机时期的政策，着眼于中长期经济发展的需要，认真思考后危机时期的政策，对于彻底走出危机，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至为重要。

开篇刘鹤的文章认为，后危机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面临稳定扩大内需、防止资产泡沫和抑制产能过剩的现实课题，孤立处理三个宏观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十分困难。而稳步推进城市化则可能获得解决这三个难题的更大回旋余地，也是明年中国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未来中长期政策的重要结合点。

白重恩和钱震杰的文章讨论了既关系到宏观需求结构又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分析了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以及居民收入占比分别大幅下降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2009年11月，《比较》和新华社新创办的《财经国家周刊》一道，举办了主题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的经济学家问卷调查，共有50位老中青三代经济学家参与了调查。《体制是关键，出路在改革》一文是此次问卷调查结果的汇总分析。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学家重点关注的是结构性、体制性、长远性的矛盾，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体制改革，理顺各种经济关系，才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搞好经济工作。

《危机时期的政策反思》是主编吴敬琏教授为《新政 vs 大萧条》一书写的序言。

他在分析有关大萧条成因的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提醒我们在作出应对危机的政策选择时,需要认真反思政府与市场、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短期宏观管理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

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学界的自我反省一直不断。《比较》曾先后在第40辑、第44辑登载了相关批评性文章。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角色,“视界”栏目特别选取了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教授的一个专访。马斯金教授认为,在危机发生前的几年中,有不少经济学文献已经警示了即将发生的金融危机,如果要避免未来新的金融危机,或者减轻未来金融危机的影响,政策制定者最好充分关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新增长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保罗·罗默及其同事查尔斯·琼斯的文章是对增长理论的最新思考。他们试图将创意、制度、人口和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纳入一个增长模型,来解释增长领域一些新的事实,包括市场范围的扩大、加速增长、人均GDP和全要素生产率巨大的跨国差异以及工人人均人力资本增加和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

“比较制度分析”栏目是两篇关于制度设计文章。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讨论了与渔业、林业及水资源系统等公共池塘资源开放获取有关的制度设计问题。她主张制度理论家们应该摒弃对简单化最优方案的追求,直面复杂的演化资源系统,分析其具有自适应性的多重治理结构。威廉·伊斯特利则讨论了制度设计的两种主要思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他认为,后者将会比前者“带来更有希望的结果”。

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资产价格和货币政策的热议。欧洲央行执委会委员洛伦佐·斯马吉对此给出了回应。他的基本观点是:货币政策恰当的首要目标是,在中期维持价格稳定。金融稳定最好是通过政策利率之外的工具,且在宏观审慎监管的更广框架下实现。但是,中央银行应该积极监控资产价格和信贷流量。这些变量的变化提供了及时且有用的信息,这有助于更好地校正货币政策的方向,避免“滞后”风险。

伦敦经济学院的彼得·布恩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西蒙·约翰逊对美联储的危机应对政策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在此次危机中,美联储虽然在短期内挽狂澜于不倒,但未能采取任何措施打破“银行出错—导致危机—政府救助”的怪圈,更糟糕的是,它还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这种情况下,除非立即展开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整个经济将会陷入下一轮“经济泡沫—泡沫破灭—政府救助”的循环,而下一轮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可能比此次危机还大。

在“法和经济学”栏目中,剑桥大学法学院公司法教授布莱恩·谢芬斯对公司治理在2008年股灾中是否失灵进行了评估。他认为,从没有能够预防股东价值大幅缩水的角度看,现行公司治理机制是失灵的,不过,如果不是单纯以这个标准来判断,公司治理在很多关键领域的运转还是令人满意的。但作者也认为,在他所研究的样本公司中,坏消息都来自金融业,因此金融业应该是监管关注的对象。

1 世界市场和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均衡
**World Markets and the Equilibrium of
China's Urbanization Model**

by Liu He 刘鹤

7 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
事实、原因和对策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of China
Facts, Explanations and Policy Responses

by Chong-en Bai and Qian Zhenjie 白重恩 钱震杰

30 体制是关键，出路在改革
50 名经济学家问卷调查
Focus on Institutions and Urging for Further Reforms
A Summary of the Survey Results of 50 Economists

b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tudies 《比较》编辑室

新书架 **New Books**

37 危机时期的政策反思
《新政 vs 大萧条》序言
Policy Reflections for China during Crisis Period

by Wu Jinglian 吴敬琏

视界 **Horizons**

41 经济学家并没有错得离谱
Economists Didn't Get It So Wrong

by Eric Maskin 埃里克·马斯金



《比较》
2009年第6期 总第45辑



前沿 **Guide**

47 新卡尔多事实

创意、制度、人口和人力资本

The New Kaldor Facts

Ideas, Institutions, Population, and Human Capital

by Charles I. Jones and Paul M. Romer 查尔斯·琼斯 保罗·罗默

比较制度分析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65 制度与环境

Institution and Environment

by Elinor Ostrom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79 制度：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Institutions: Top Down or Bottom Up

by William Easterly 威廉·伊斯特利

政策评论 **Policy Review**

84 资产价格和货币政策

Monetary Policy and Asset Prices

by Lorenzo Bini Smaghi 洛伦佐·斯马吉

95 下一轮更严重的金融危机悄然逼近

The Next Financial Crisis

It's Coming and We just Made It Worse

by Peter Boone and Simon Johnson 彼得·布恩 西蒙·约翰逊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101 2008年股市崩溃期间公司治理失败了吗？
以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为例

**Did Corporate Governance "Fail" During the
2008 Stock Market Meltdown?**

The Case of the S&P 500

by Brian R. Cheffins 布莱恩·谢芬斯

主编 吴敬琏

编委名单 崔之元

(按拼音排序) 高世楫

郭树清

焦津洪

李剑阁

林毅夫

楼继伟

卢 迈

钱颖一

荣敬本

王则柯

吴敬琏

吴晓灵

谢 平

许成钢

张春霖

赵人伟

周小川

责任编辑 肖 梦

吴素萍

世界市场和 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均衡

刘鹤

一、市场需求是后危机时代全球 经济最稀缺的资源

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人们讨论的重点已经从超常规的市场干预转向对汇率波动、初级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和结构性流动性过剩等短期问题的困扰，以及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何时退出、怎样防范主要储备货币贬值所引起的资产泡沫等。在发达国家，焦点是怎样扩大就业和应对去杠杆化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后果；在新兴市场国家，焦点是怎样应对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带来的负外部性和为产能过剩寻找市场。像历次经济危机一样，周期现象正在以新的方式有规律地进入下一个阶段。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也将一波三折，没有五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全球经济很难恢复常态。最近迪拜房地产公司违约给世界带来的惊恐，让我更坚信这个判断。冷静而有序地解决短期问题都是非常必要的，但仅从短期角度和应用传统的新古典教义是不可能使世界走出危机阴影的。我们应该换一个视角，认真思考一些短期和中长期结合的战略性问题。

最基本的问题是，这场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实质性冲击到底是什么？后危机时代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怎样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新的需求平台。

我的基本看法是，这场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而实质上是对现存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危机发生后的事实表明，以往认可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运行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原有的三角形增长格局已经无法持续，而新的全球化增长新格局尚在痛苦的探索之中。

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全球形成了美国提供市场、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产品、资源富集国提供原油和初级产品的实体经济三角形分工格局，并相应出现了与各国国际收支状况相反的资本逆向流动局面。这个三角形格局，既是全球生产力从国家经济向全球经济分工深化的结果，也是各国相对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结果。但新格局不无风险。最大的风险是支撑三角循环的基础并不牢固；全球经济过度依赖美国消费市场和美国货币发行数量。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高度负

* 本文是作者最近会见美国国务院、美国财政部、美联储、英国外交部有关负责人时所谈观点的整理。

债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由于资产泡沫破裂所导致的企业和个人债务去杠杆化将成为中期现象,这使得世界失去了巨大的市场增量,全球化中的三角形分工格局也失去动源。在危机面前,不少人把全球化和国际分工视为元凶,为了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利益,纷纷出台极其短视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政策,主要发达经济体也提出各种既不符合消费者利益、也不切合生产者实际能力的再工业化主张。这些情况表明,全球经济总供求格局将继续失衡:收入下降和去杠杆化持久化使美国主导的消费市场在相当长时间内可能丧失动能,国际市场边际增量急剧减速;总需求减少,而一些经济体的“再工业化”则使总供给增加,在没有新的重大技术突破条件下,全球性产能过剩也会加剧。在超常规的宏观政策刺激下,短期危机可能出现缓解,但经典式的生产过剩危机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所加剧。

众所周知,市场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市场需求,所有的短期经济干预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可以推论,结构性的全球市场收缩将成为一个中期现象,可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际市场将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最稀缺的资源。因此,我们必须从全球视角深入思考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未来的全球巨大市场需求可能在哪里产生?为加快形成这个未来的巨大市场,需要创造什么样的必要条件?更准确地说,需要创造什么条件使一个规模巨大的中等收入者阶层脱颖而出?现在看来,从全球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制度准备条件来分析,这个巨大的市场就在中国,而关键就在于稳步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中等收入者规模稳步扩大。

粗略估计,如果未来十年中国的中等

收入者比重达到政府提出的 50% 以上的目标,全球将获得一个大于欧洲市场规模的新大陆。众所周知,“金融巫术”引发了深度危机,而目前一些国家提出的“保护主义巫术”,则可能把世界引向新的灾难。唯独共同维护和创造中国的巨大市场,才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正解。因此,放弃冷战思维,为了自身利益而推动中国市场发育的观点,确实值得发达国家的政策精英认真思考。借此机会,我想重复自己在 1990 年代初提出的一个观点:未来 20 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中国的城市化和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目前,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对后者提出要求,而 2010 年中国加速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则使前者获得新的动力。

二、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是 2010 年短期政策和未来中长期政策的结合点

去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在全球普遍陷入衰退的情况下,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取得的成绩世人瞩目。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突出的问题是,外部需求持续低迷和国内一些领域产能过剩并存,货币信贷投放规模较大和实体经济缺乏新增长点,使宏观经济面临资产泡沫化风险。由于预期因素的主导,以本币数量增加为标志的资本净流入增大,则加大了资产价格上涨压力。于是有人提出,中国有可能重蹈日本“失落十年”的覆辙。不少国际学者列举了很多似曾相识的现象,如巨额贸易顺差、资产价格泡沫、公司治理方式和就业模式僵化等,证明中国有可能陷入与日本一样的困境。我倾向于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基本不可能的,因为中国

与日本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比如：中国 2009 年的城市化率约为 46.7%，而日本 1988 年的城市化率为 62.1%，仅此一项指标，就可以看到中国仍有巨大的内部发展空间。对于 2010 年的经济政策来说，最为可喜的是，在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问题上各方面终于获得共识。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是明年中国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未来中长期政策的重要结合点。这是一项意义极其重大的决策。

2010 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现实课题，是稳定扩大内需、防止资产泡沫和抑制产能过剩。扩大内需政策的目的一，是弥补外需减少进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抑制产能过剩则意味就业岗位的缩减；同时，扩大内需意味着货币供应量继续增加，但在微观经济主体面临着投资方向选择困难且市场回报率不确定时，更会倾向于从事投机性的避险行为。由此看来，孤立处理三个宏观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十分困难。

稳步推进城市化则可能获得解决这三个难题的更大回旋余地。从需求角度看，城市化的推进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住房投资需求将继续增长；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增加特别是中等收入阶层人数逐步上升，无疑会带来新的消费需求，对普通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将大大增加。从供给角度看，城市化所带来的投资需求将有利于消化过剩的产能。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钢铁、水泥等行业存在大量过剩生产能力，将这些生产能力进行兼并重组和提高生产集中度是必要的，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强力推进也会使社会短期成本很高。城市化创造出的投资需求，是消化这些“过剩”生产能力的主要渠道。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创造的需求，将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

到重要导向作用，基础设施、制造业、营销网及其他服务业的发展将获得更加明确的生产方向。从金融体系的资金状况来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信贷投放的数量高达 9.7 万亿元，比 2008 年增加了 40% 左右，这是史无前例的。已经投放的大量流动性需要有效消化。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扩张的支撑，流动性过剩带来的可能是另一轮资产价格泡沫。在明确的城市化政策导向下，巨大的流动性可能不再过多进入到黄金市场、石油市场或资本市场，而是流入到与实体经济紧密关联的建设领域。这样，中国宏观经济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局面，城市化健康发展恰恰能将流动性配置到恰当的实体经济领域。

三、均衡理念和城市化模式选择

“均衡”的概念，以往只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讨论。在微观含义上指的是价格均衡，这是供求双方在市场上反复“讨论”后的结果；在宏观含义上指的是总供求均衡，指的主要是汇率、利率、物价和内外收支的均衡。总之，均衡是市场机制动态调整和各类市场行为主体反复选择的最终结果，在均衡点上反映的是个人、企业、政府的利益共识。今天，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也遇到了经济学上的均衡问题：即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可以使个人、企业和政府满意，并且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试图用价格理论解释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多有建树，特别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和诺斯的劳动力数量理论都十分精彩。今天，中国的城市化模式选择也面临着供求价格的均衡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有大城市为主和小城镇为主的两派之争，双方的理由都很充分，相互争执不下，在实际政策执行中导致不少困惑，后来干脆出

现了“宜大则大、宜小则小”的折中说法。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实质问题，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变为有就业、有住所、有社会福利和有文明素质的市民，并且逐步成为中等收入者。实际的情况是，简单的特大城市发展模式走不下去。在现存的社会资源配置特别是教育、医疗资源配置条件下，具备资金、知识条件的群体大量涌进大城市，这使其进入门槛越来越高。特别是土地资源有限而购房需求旺盛，使大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交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条件也难以适应城市人口密度的急速提高。比如：北京、上海的平均房价正在向每平米2万元迈进，目前还看不到有大幅下降的任何迹象。虽然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但生活成本高，农民工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生活质量之间的选择十分困难，政府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也面临两难选择。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城市发展进程。同样，中小城镇发展模式也走到尽头。遍地开花式的中小城镇，造成土地资源大量浪费、能源利用效率低下，也带来十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国际市场条件变化，更使中小企业难以扩大就业机会。人口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也限制着服务业通过相互提供市场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转移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没人去”的情况表明，中国城市化模式面临均衡点的确定。在一系列复杂变量中，就业机会和价格剩余之间的均衡，是决定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基础性供求变量。说得更简单一点，这个均衡点就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平衡表的左边是在城市工作的收入预期，右边是以住房、教育和其他支出构成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储蓄节余和自我尊严

的满足感等社会心理指标。这个平衡表的右项节余如果高于务农，就会有从农村注入城市。对这种状况，刘易斯已经做了类似场景的几何描述，这是理想的均衡状态。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认同，即便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支出大于收入，仍然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溢出，一部分人则成为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的城市不稳定性新社会群体。这时，通过城市化均衡模式的创造，实现转移人口收支平衡，进而在社会稳定状况下有序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成为极其关键的因素。看来，根据新古典学派的均衡理论，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不可能达到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均衡点的，政府也要发挥必要的作用，“看不见的手”需要“看得见的手”的帮助，要通过两者的有机结合，创造条件促进新的均衡。

正是由于这些考虑，我更倾向于加快建设城市网（City Networking）。我认为，“城市网”是均衡发展理念下的城市化模式，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 and 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这样既能够实现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又可以避免单个城市盲目扩张带来的大城市病，既可以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又可以避免小城镇缺乏就业机会的现象。在这一模式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中小城镇侧重为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这样的模式安排使市场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可以实现预期目标：个人收入增加、公共服务职能优化和国家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目前在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塘地区，已经出现了这个良好的发展趋势，这可能是国家需要的、也是农村转移人口可以接受的城市化发展模式，需要

积极加以引导。

四、推进城市化的几项年度政策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当中，重点要处理好几个相互联系的现实问题：

1. **新一代农民工在城镇落户问题。**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事实可以证明，双向流动就业模式的假设是不牢固的。作为我国产业工人主体的2亿左右农民工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年轻一代，长期定居城镇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部分农民转为市民是非常迫切的要求。我们必须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好农民工就业、居住、就医等问题，特别要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积极推进户籍制度和廉租房制度改革，这是明年扩大内需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2. **规划和启动“城市网”公共工程建设。**由于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高不可及，直接在大城市落户的思路在明年可能走不通。因此，应该在“城市网”的理念指导下，尽早规划和启动一批公共建设工程，加快大城市和周边中小城镇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加快外围地区的廉租房建设，做好改善教育、医疗条件的规划方案，创造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条件，使城市化发展导向与明年社会政策取向高度吻合。

3. **地方政府融资制度化。**实现城市化的发展模式需要巨额资金投入，这是作为城市化建设主体的地方政府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所面对的主要难题。因此，从实际出发，形成一套适应中国城市化需求的投融资机制和监管体制，实现城市网建设的现金流量平衡，是推动中国城市化稳步发展的又一关键环节。土地融资模式在微观层面似乎合理可行，一些地区的做法使当地政府和农民都比较满意。但最大的

困难是，这种模式带来的宏观后果还不甚清楚，目前在耕地保护和农产品平衡点等基本问题上的争议还很大，因此要审慎对待，继续试验。地方政府通过商业银行融资的借贷模式存在财力支付风险，由于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减缓，还本付息的压力较大，这种模式很难持续。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下，建立正常的地方发债制度和适时推出物业税，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选择方案。

4. **城市网和应对气候变化、建立资源友好型社会理念的结合。**明年经济政策的重点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由于城市发展是中国扩大内需的主要载体，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就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城市规划要体现科学发展理念，城市发展要努力依托服务经济，城市建筑、居民住房、公共交通要提高节能环保标准，城市绿化也要有碳汇效应。

5. **高度重视完善教育系统，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改革严重滞后、教育质量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判断，是久已形成但一直没有明说的社会共识。今后推动城市化稳定发展的真正制约，不仅是户口制度、住房条件等表面问题，提高人力资本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才是稳步推进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所在。因为中国推进城市化的目的，不是把农村的低收入者变为城市贫民，而是要在减少二元结构落差的历史过程中，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从建设和谐社会角度，深入认识教育的重要作用。在短期内，要通过完善培训制度，提高劳动者技能。从长期看，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基础教育、提高人口素质，这是实现城市化战略的充分和必要条件。钱学森教授的遗言，的确需要我们深刻反思并采取认真、大胆、扎实的改革举措加以落实，也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实现由世界工厂向全球巨大市场的转变。

附录：

表 1 中国城市化率的国际比较

	中国	日本	韩国	美国	英国	法国
1980	19.39	59.60	56.70	73.70	87.90	73.30
1981		59.80	58.34	73.86	88.04	73.38
1982		60.00	59.98	74.02	88.18	73.46
1983		60.20	61.62	74.18	88.32	73.54
1984		60.40	63.26	74.34	88.46	73.62
1985	23.71	60.60	64.90	74.50	88.60	73.70
1986		61.10	66.68	74.66	88.62	73.78
1987		61.60	68.46	74.82	88.64	73.86
1988		62.10	70.24	74.98	88.66	73.94
1989	26.21	62.60	72.02	75.14	88.68	74.02
1990	26.41	63.20	73.80	75.30	88.70	74.10
1991	26.94	63.40	74.68	75.70	88.76	74.26
1992	27.46	63.70	75.56	76.10	88.82	74.42
1993	27.99	64.00	76.44	76.50	88.88	74.58
1994	28.51	64.30	77.32	76.90	88.94	74.74
1995	29.04	64.60	78.20	77.30	89.00	74.90
1996	30.48	64.72	78.48	77.66	89.08	74.08
1997	31.91	64.84	78.76	78.02	89.16	75.26
1998	33.35	64.96	79.04	78.38	89.24	75.44
1999	34.78	65.08	79.32	78.74	89.32	75.62
2000	36.22	65.20	79.60	79.10	89.40	75.80
2001	37.66	65.32	79.84	79.44	89.46	75.98
2002	39.09	65.44	80.08	79.78	89.52	76.16
2003	40.53	65.56	80.32	80.12	89.58	76.34
2004	41.76	65.68	80.56	80.46	89.64	76.52
2005	42.99	65.80	80.08	80.80	89.70	76.7
2006	43.90	66.00	81.02	81.02	89.78	76.92
2007	44.94					
2008	45.68					

注：日本城市化率统计标准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如按相同标准统计，日本的城市化率目前已超过 90%。

表 2 中国历年信贷增量

年份	新增贷款（万亿元）	广义货币增长（%）	贷款余额增速（%）
2000	0.56	14.0	13.4
2001	1.29	14.4	11.6
2002	1.80	16.8	15.8
2003	2.77	19.6	21.1
2004	2.26	14.6	14.5
2005	2.35	17.6	13.0
2006	3.18	17.0	15.1
2007	3.63	16.7	16.1
2008	4.91	17.8	18.7
2009 年前三季度	8.70	29.3	34.2

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 事实、原因和对策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of China Facts, Explanations and Policy Responses

白重恩 钱震杰

一、引言

国民收入分配一直是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中心问题，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 (Factor Shares in National Income)，也称为国民收入的功能性分配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讨论国民收入在劳动、资本和税收之间的分配情况；二是国民收入在企业、居民和政府间的分配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by Institutional Sector)，通常被称为国民收入机构部门分配。从发生次序来看，在初次分配阶段，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和机构分配是统一过程中的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是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于是要素分配的结果形成各机构部门的初次分配收

入，即所谓的延伸性要素分配 (Extended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阶段，各部门以初次分配收入为基础发生经常性转移支付，最后形成各部门可支配收入。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以及居民收入占比分别大幅下降的现象，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¹ (如图1)。这两个比重的大幅下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原因，与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有关。首先，国民收入分配是所有收入分配问题中最重要内容，它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收入分配差距 (Atkinson, 2000)。作为一个资本市场不发达、资本要素分布极为不均的国家，中国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向资本、企业和政府倾斜，则不仅意味着收入差距会扩大，更可能上升为政治问题，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SEM) 及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 (NIFS)，本研究得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基金号 70625002) 和中国博士后基金 (基金号 20090450403) 的支持。

¹ 严格地讲，国民收入分配应该是各类收入在国民收入 (GNP) 中所占的比重。但在要素分配方面，主要数据来源为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 (GDP) 数据，为保持各种分配比重的可比性，本文用 GDP 代替 GN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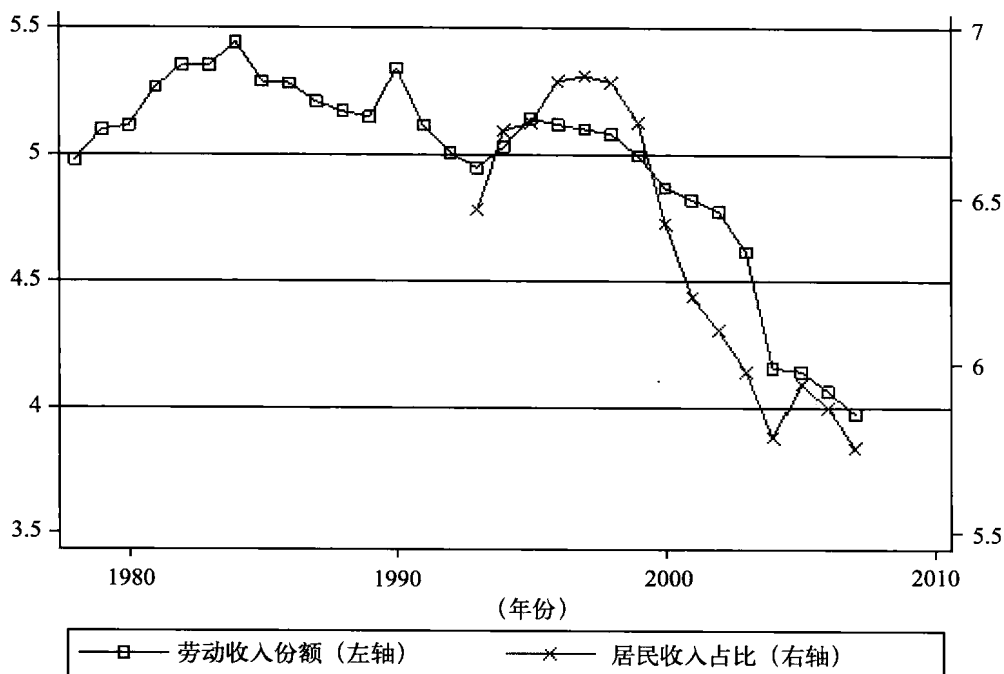


图 1 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收入占比

数据来源：(1) 劳动收入份额：即劳动者报酬在 GDP 中所占比重，为省际收入法 GDP 数据计算的各省劳动收入份额的加权平均，1978~1992 年数据来自 China's National Income, 1952~1995 年 (Hsueh 和 Li, 1999)，1993~2004 年数据来自 1952~2004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国家统计局, 2007a)，2005~2007 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8 卷。(2) 居民收入占比：即居民可支配收入在 GDP 中所占比重，居民可支配收入来自资金流量表，其中 1992~2004 年的资金流量表来自 1992~2004 年《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2008)，2005~2007 年的资金流量表来自 2008~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卷，各年 GDP 数据来自 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

因此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很可能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带来深刻的影响 (Subramanian, 2008-2-8)。

其次，国民收入分配与宏观需求结构有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所占比重是资本回报率的重要决定变量，而后者则是衡量宏观投资效率的自然指标 (白重恩、谢长泰和钱颖一, 2006, 2007)。白重恩、谢长泰和钱颖一 (2007) 对中国 1978 年以来的资本回报率的测算表明，尽管中国的投资率从 1995 年以来开始上升，并在近年来持续保持在 40% 以上的水平，但平均资本回报率却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原因是同一时期的资本收入

份额一直在上升，抵消了资本—产出比提高对平均资本回报率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与高投资率相对应，我国消费需求的增长率一直都低于 GDP，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居民作为消费需求的主要来源，其收入占比的持续下降，显然会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

基于国民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问题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以及它与宏观需求结构的密切关系，中共中央在党的十七大中明确地提出了“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在 GDP 中的占比”的要求，而国民收入分配领域也随之出现了许多学术性研

究。白重恩、谢长泰和钱颖一(2007)指出,我国要素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资本收入份额不断上升,使得我国资本回报率在投资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因此要素分配的变化是解释我国投资率高企的重要原因。高路易(Louis Kuijs, 2005),李扬和殷剑峰(2007)讨论了企业、居民和政府的储蓄变化对我国的国民储蓄率带来的影响,发现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上升是我国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白重恩等人(2008)对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下降原因进行了讨论,并认为国有经济改制和垄断增加是主要的原因。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2009),罗长远和张军(2009)指出产业结构转型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c)关注税负水平和经济开放程度对要素分配的影响,指出税负增加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而对外贸易则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李扬和殷剑峰(2007)、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b)对企业、居民和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在收入分配的初次阶段企业和居民收入占比分别上升和下降,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持续下降。

由于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内容很多,上述各研究仅能针对某一方面进行分析。因此一项研究很难同时回答以下几个密切相关的问题:第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其原因;第二,国民收入分配和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为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应朝什么方向改进;第三,为了有效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政策体系该如

何设计。上述三个问题间存在逻辑上的递进关系,我们在了解了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具体事实后,才能全面和正确地分析国民收入分配变化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有效的政策建议。正是由于无法同时兼顾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全面了解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不能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目标给出准确的定位,所以当前关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方面的许多政策建议,无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体系化的思考,往往只重一点不及其余,甚至还有一些政策建议不以定量分析为基础,根本无法判断其有效性,这显然为政策制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本文的出发点是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相关的观点或政策建议进行评析,并对改进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有效政策进行总结。这要求我们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事实为基础,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原因进行全面分析,唯此才能对各种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评析,有的放矢地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集中介绍了当前关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些主要观点,并讨论了这些观点隐含的假设。第三、第四部分是本文所有观点和政策建议的基础,也是本文的重点。在这两部分中,我们依次从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要素收入在机构部门间的延伸性分配,以及各机构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等三方面进行分析,详细地讨论了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事实及其变化原因。第五部分对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相关政策进行总结。

二、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政策讨论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急需改进是目前学

界和政策界普遍所持的观点，但就如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在如何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问题上，观点则莫衷一是。

由于劳动者报酬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动者报酬在 GDP 中的比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显然是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人们围绕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政策建议。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工资由企业说了算，因此工资总是被抑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导致经济增长中劳动收入份额逐渐下降（苏海南，2008-3-26；*Economists*，2007-10-11）。这一论断，很自然地使人相信通过“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或行政手段可以提高工资水平，进而增加劳动收入份额。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劳动和资本存在替代性，劳动相对于资本成本上升时，厂商将用资本替代劳动，减少劳动—资本比。因此提高工资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取决于劳动与资本的相对价格上升幅度和劳动—资本比的下降幅度。具体而言，就是取决于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当替代弹性大于 1 时，劳动—资本比下降的幅度大于劳动相对价格上升的幅度，劳动收入份额将减少；当替代弹性小于 1 时，劳动—资本比下降的幅度小于劳动相对价格上升的幅度，劳动收入份额将上升；但当替代弹性等于 1 时，两者的变化幅度一样从而相互抵消，劳动收入份额不发生变化。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是否是因为工资增长速度太慢，采用政策手段提高劳动力工资是否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取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要素替代弹性，而这需要严谨的数据分析才能得到。

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是劳动者与厂商的讨价还价能力下降或者缺失，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应设法增加劳动者对厂商的讨价还价能力（汪同三，2007-10-29；苏海南，2008-3-26；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2009）。基于该观点的一个政策建议是“推行区域或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并已开始为一些政府官员所接受²。研究表明，工人和厂商之间如果仅就工资水平进行议价，那么磋商的结果只会影响工资水平。与第一种观点类似的是，由于劳动与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引起要素之间的替代，这时候劳动收入份额是否发生变化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Bentolila 和 Saint-Paul，2003）。如果工人能就工资水平和雇用员工数量同时与厂商进行谈判（称之为“有效议价”），劳动者谈判能力较强时，这种谈判能够使劳动收入份额在短期内增加。在长期内，受利润下降的影响，处于利润边界的企业将逐渐退出经营，失业随之增加，平均工资下降，从而减少劳动收入份额；对于那些能继续经营的具有垄断利润的企业来说，由于存在垄断利润，集体协商议价结果将继续维持，这将进一步拉开垄断企业 and 非垄断企业员工之间原本就已存在的收入差距，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均。因此，“有效议价”不仅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Blanchard 和 Giavazzi，2003），而且还会增加收入分配差距，因此我们一般不赞同在经济中推行“有效议价”机制。从提出的政策建议来看，第二个观点更倾向于在劳资之间进行价格谈判，而不是“有效议价”，因此与

2 例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曾表示要“在非公有制企业集中的地区，积极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http://news.hexun.com/2008-02-27/104084014.html>）。